

# 新概念

第四辑

大象出版社

# 新概念

第四辑

主编  
王中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哲学. 第4辑 / 王中江主编.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5.6

ISBN 7-5347-3828-8

I. 新... II. 王... III. 哲学—文集 IV. B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3281 号

出版人 李亚娜

策划人 耿相新

责任编辑 吴韶明

责任校对 钟 骄

封面设计 秘金通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http://www.daxiang.cn)

制 版 郑州艾乐出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49 千字

印 数 1—2 000 册

定 价 29.2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 231 号

邮政编码 450000

电话 (0371)66202901

# 学术编辑委员会

## 学术顾问

任继愈 李学勤 叶秀山 庞朴 汤一介 余敦康 李亦园  
耿云志 杜维明 陈鼓应 韦政通 罗多弼 黄俊杰 王树人

## 学术委员(按姓氏笔画)

万俊人 王路 王晓朝 王葆玹 刘小枫 刘笑敢 许纪霖  
孙歌 刘岳兵 汪晖 李明辉 李存山 何怀宏 吴国盛  
陈来 陈少明 杨国荣 张祥龙 张汝伦 张宝明 张曙光  
张斌峰 郑大华 庞元正 赵敦华 胡军 姜广辉 郭齐勇  
钱永祥 高瑞泉 倪梁康 徐友渔 高力克 葛兆光 童世骏  
景海峰 韩庆祥 韩震 彭国翔 慈继伟 黎红蕾

主编 王中江

## 本辑作者

- 李存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斌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单 纯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梁晓杰 中央党校哲学部副教授  
余敦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王树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胡 军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 路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晓朝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欧阳康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南湜 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韩庆祥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丰子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吴晓明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邹广文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刘笑敢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威威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森秀树 日本立教大学文学部教授  
田义勇 郑州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王中江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唐文明 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林可济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教授  
郑大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史革新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其泰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教授  
宋志明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刘桂生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目 录

## 我们时代哲学的角色和使命

哲学以人类价值的总协调为己任	李存山( 1 )
哲学的批判本性与中国哲学的创新	张斌峰( 8 )
哲学:定义层面的反思	单 纯( 22 )
“哲学正名”	梁晓杰( 29 )

哲学之新 新在问题	余敦康( 45 )
试论哲学的人文关怀	王树人( 48 )
哲学何以源于惊讶	胡 军( 52 )
哲学的宽泛与狭隘	王 路( 55 )
全球文明对话视野下的中国哲学	王晓朝( 60 )

##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探索

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和当代形态	欧阳康( 64 )
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	王南湜( 81 )
对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一种解读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	韩庆祥( 89 )
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方法论	丰子义( 101 )
重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与意义	吴晓明( 110 )
历史、价值与人的存在	
——种文化哲学的解读	邹广文( 124 )

## **中国哲学：探索与新视角**

- 经典诠释中的内在定向刍议 ..... 刘笑敢(139)
- 王弼解读《论语》的玄学特色 ..... 王威威(158)
- 嵇康的“超越”和“神秘”  
——以养生论、音乐论的争论为中心 ..... 森秀树著 刘岳兵 陈继东译(167)
- 通脱气象：苏轼的哲学思维试论 ..... 田义勇(179)
- 清末民初中国认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  
——以“强权”与“公理”的两极性思维为中心 ..... 王中江(188)
- 中国语境中的儒教与世俗化问题 ..... 唐文明(241)
- 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诠释  
——从张世英先生《新哲学讲演录》等著作说起 ..... 林可济(250)

## **近代中国思想语境中的“激进”与“保守”**

- 为“保守”与“激进”划界 ..... 郑大华(261)
- “保守”与“激进”范式的有效性 ..... 史革新(265)
- 回到具体的历史时空 ..... 陈其泰(269)
- “激进”与“保守”辨析 ..... 宋志明(272)
- “保守”与“激进”的名和实 ..... 刘桂生(275)
- 现代中国思想的内在复杂性 ..... 许纪霖(278)
- 编后卮言 ..... (283)

# 哲学以人类价值的总协调为己任\*

□李存山

## —

“哲学何为”或“哲学是什么”，此乃“哲学”这个学科特有的历久常新的问题。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家张东荪就写过《哲学究竟是什么》一文，有意思的是，他首先为提出这个问题的“合法性”作了辩护。他说：

哲学的性质颇有些奇怪的地方。学科学的大学生虽然在一年级未必能知道所学的那一门学科（例如物理学或化学或生物学）究竟是什么，然而等到学到第四年级终了，毕业以后必可明白其性质。但学哲学的大学生往往等到学完了四五年以后，方才恍然大悟，自己能够提出一个问题曰：哲学究竟是什么？……可见学科学是愈学愈明白，对于对象愈得有所确信；而学哲学则愈学愈加怀疑，其结果愈须反躬自问。然须知学哲学而学会了怀疑，知道问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乃是学哲

\* 编者按：哲学在我们的时代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世界性的恐怖主义、不同文明的尖锐冲突、生物技术引发的生命及人性和伦理问题、过度追求增长而造成的自然和生态循环的失常、世俗化利益追求和消费文化的膨胀等等，这些问题都非常棘手，令我们十分不安和困惑；哲学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公众不仅对它越来越感到陌生，就是哲学家之间往往也彼此陌生；哲学脱离开意识形态之后，似乎又在疏离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而孤独化，在公共世界中哲学家的声音愈来愈稀少了。

哲学不能逃避这些问题和挑战，身处其中的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哲学的尴尬局面，哲学需要重新鼓起勇气担当起自己的重要角色和使命。作为巨大课题的一种小小回应方式，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系与《新哲学》集刊学术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就“哲学角色的境况”、“哲学与神圣性和世俗化挑战”、“哲学的反思性和批判意识”、“我们时代哲学的意义和性质”、“哲学与公共生活”、“我们时代的‘人性’”、“全球性冲突、文明对话与中国哲学”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现在本栏目分上下两组（专论和笔谈）刊出相关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兴趣。

学的成功，并不是失败。不但学哲学的学生有此情形，即我们研究了几十年的人亦是如此。<sup>①</sup>

我是学哲学学得不算很成功的一个，乃至在研究生毕业差不多十年之后才有了对“哲学究竟是什么”的困惑，其缘由是读了在《中国文化》杂志上发表的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总结”。这篇“总结”的第一部分是讲“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亦即讲“哲学是什么”以及“哲学何为”。冯先生先用“负的方法”来说哲学“不是什么”，即“哲学不是初级阶段的科学”，也不是“人类知识发展到现在的最高的产物”，亦即不是“太上科学”。冯先生说：“这是它的性质所决定的。真正哲学的性质，如我在《新理学》中所说的‘最哲学的哲学’，是对于实际无所肯定，科学则是对实际有所肯定。”如果用“正的方法”来表述，冯先生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或者说“哲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哲学的作用就是：“看着似乎是无用，但可能是有大用。哲学不能增进人们对于实际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sup>②</sup>

以上冯先生的观点对我的内心有很大的震动。因为冯先生提到毛泽东对哲学的看法，即“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这种观点（以及“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我们以前从哲学的教科书中所学到而且一般都接受的。冯先生还提到建国以后哲学系的教育情况：“当时的哲学工作者根据毛泽东的思想，认为要学习哲学，必须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基础，规定哲学系的学生在一、二年级必须先学一点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于是就开了一些课，讲授一些类似某种科学大纲或概论的课程。……这种制度，从实践上证明是行不通的。”<sup>③</sup>冯先生所说的情况，在我们“文革”后入学时仍基本如此，当时的北大哲学系曾为我们开了高等数学、生物学和现代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概论的课程，而我们对于这些知识也是尽量吸收而惟恐不及的。

读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引起我内心的震动，遂产生“哲学究竟是什么”以及“哲学何为”的困惑。因为我对冯先生的观点参悟不透，故此困惑持续几年，后来看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著《什么是哲学》一书，于是“对症下药”，试图通过读此书来解决心中的困惑。此书对西方历史上的“哲学活动”特别是近代以来经历的从实证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反哲学时期”作了“根本的分析”，从而提出“人是可以进行‘有意义的思考’的生物”，而哲学就是出自人的本性的对宇宙的“整全的”认识，或者说“哲学——就是关于‘宇宙’可

<sup>①</sup> 张东荪：《科学与哲学》，第171页，商务印书馆，1999。

<sup>②</sup>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0卷，第653~65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sup>③</sup> 同上书，第654页。

言说的一切”<sup>①</sup>。我当时认为,哲学必须言说,这类似于冯先生曾经指出的“哲学是说出或写出之道理”;而作者所谓哲学是对宇宙的“整全的”认识,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相通。我尤其肯定了作者关于“宇宙的基本实在就是‘我的生活’”、“寻求实在的哲学活动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的思想,认为这是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相通的。<sup>②</sup>

读加塞尔的《什么是哲学》,使我近乎回到了哲学教科书中的传统观点,当然,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回复。我当时还强调,宇宙的基本实在不仅是“我的生活”,而且是“我们的生活”。因此,哲学应该以“我们的生活”为基点,对宇宙有“整全的”认识,从而指导“我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

## 二

应该说,读加塞尔的书只是部分地缓解了我心中的困惑,或者说只是阶段性地解决了我对“哲学是什么”以及“哲学何为”的认识。这种心中仍潜存的不安,在我读皮亚杰的《人文科学认识论》时才又得到疏解。

皮亚杰的这本书是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的一个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报告。他把“人文社会科学”分为四组,即把探求“规律”的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等等,归于A组“正题法则”科学;把那些以重现和理解在时间的长河中展开的社会生活的全部画卷为己任的学科归于B组“人文历史科学”;C组是具有“规范”意义的“法律科学”;而最后一组是“极其难于分类的一组,即哲学学科,因为献身于这类学科的学者们对应归入这一名称之下的各分支的意义、范围甚至统一性,意见颇不一致”。但他又说:

惟一肯定的命题——因为各学派看来都同意这一点,是哲学以达到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为己任,也就是说达到一种不仅考虑到已获得的认识和对这些认识的批评,而且还考虑到人类在其一切活动中的各种信念与价值的世界观。<sup>③</sup>

皮亚杰并没有明确地界定“哲学是什么”,但他明确地说出了“哲学何为”,即“哲学以达到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为己任”。按照皮亚杰所说,这是“惟一肯定的命题——因为各学派看来都同意这一点”。我想,皮亚杰可能高估了哲学各学派对这个命题的“同意”度。不过,我本人是很同意这个命题的。

“哲学”(philosophy)在古希腊文的本义是“爱智之学”。此中的“智”不是指一

<sup>①</sup> 何·奥·加塞尔:《什么是哲学》,第36~37、61页,商梓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

<sup>②</sup> 参见拙文《随着生活之树发展的理论是常青的——读〈什么是哲学〉》,《文史哲》1998年第1期。

<sup>③</sup> 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第8页,郑文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般的智慧，更不是“小聪明”，而是一种大的智慧。<sup>①</sup>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之名，但很早就有“哲”和“哲人”的表述。《尚书·皋陶谟》有云“知人则哲”，《正义·注》：“哲，智也，无所不知”；《疏》：“哲，大智也，无所不知。”“哲”在中国古代也是指“大智”。孔子临终时慨叹而歌：“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所谓“哲人”显然亦是指“大智”之人。

“哲学”在古希腊曾被认为是“人类知识的总名”，有“无所不知”之义。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先假定：哲人知道一切可知的事物，虽于每一事物的细节未必全知道。”但古希腊哲学的“急务”（所谓“第一哲学”），则亦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亦即研究关于“形而上学”的知识，哲学家“所考察的都是普遍真理与原始本体”。<sup>②</sup> 中国古代的“哲人”也是“无所不知”，但其首重“知人”，如《论语·颜渊》篇记载：“樊迟问‘知’，子曰：‘知人。’”亦如孟子所说：“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孟子·尽心上》）此“先务”即是先“知人”。但《中庸》云：“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因此，中国古代的哲学是“究天人之际”，亦即研究普遍的“天人之学”。

哲学是“爱智之学”，或“希哲之学”（“希”如周敦颐《通书》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希”）<sup>③</sup>，此“智”或“哲”是指“大智”。那么，此“大智”应当“何为”呢？难道此“大智”真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只是“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sup>④</sup>吗？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哲学虽然“无用”，但它应该有“大用”。我之同意皮亚杰对“哲学学科”的那个表述，就是认为哲学的“大用”应该是“以达到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为己任”。

古希腊哲学虽然只是“为求知而从事学术”，但它实际上已是对人类各种价值的一种“协调”，即它把“求知”或“求真”置于其他的价值之上。而中国古代哲学在这一点上却更为明确，即其“知天”是为了“知人”，“推天道以明人事”，其宗旨是“爱人”，把“原善”（善即“爱人”）和“为治”（治即“安民”），<sup>⑤</sup>置于其他的价值

<sup>①</sup> 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对“智慧”的诠释，吴寿彭译注云：“‘智慧’（σοφία）一字出于伊雄语，其要义有三：(1)一般聪明与谨慎，(2)敏于技艺，(3)学问与智慧。其后在学术方面分别了小巧与大智，遂以此字专主大智。”《形而上学》，第4页，商务印书馆，1981。

<sup>②</sup> 同上书，第4、56、61页。

<sup>③</sup> 日本近代哲人西周最先把“philosophy”翻译为“希哲学”，后改为“哲学”。参见柯雄文《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影响》注⑦，《20世纪末的文化审视》，第198页，学林出版社，2000。

<sup>④</sup>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5页。

<sup>⑤</sup> 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原道”实即“原善”，戴震的主要哲学著作是《原善》。司马迁论先秦六家要旨，谓此皆“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

之上。中国古代有“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之说,中国哲学就是在此“三事”中作一个以“正德”为先的“总协调”(虽然这种“总协调”还须随时代的发展而再协调,“三事”之外也还须有科学意义上的致知、政治意义上的立制以及审美等等相对独立的价值)。《易传·系辞下》云:“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可见,《易传》的“大智”(“精义入神”、“穷神知化”)就是要协调“崇德”与“利用安身”之间的关系。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从“无极而太极”讲起,最后落实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极”即最高的价值标准。“横渠四句”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其所“立”者也是要立一个生生之“理”,即价值的标准、生活的准则。

哲学不是宗教的信仰,而是一种“爱智”或“希哲”的活动,是“说出或写出之道理”。因此,哲学的确立价值(以及价值的层次)不是诉诸天启的真理和神秘的梦想,而是诉诸对宇宙和人生的“整全的”认识,此所以中国古代哲学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在现代社会,“推天道以明人事”已经在知识上和价值上有很大的局限,因此,现代哲学的“以达到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为己任”,必须“考虑到已获得的认识和对这些认识的批评”(此所以“分析哲学”有其哲学的合法性),还必须考虑到“人类在其一切活动中的各种信念与价值的世界观”(此所以哲学是以“关于世界观的学说”的形式来协调人类的各种价值)。因此,哲学的活动不仅是对知识命题作“逻辑的分析”,也不仅是提出一种“关于世界观的学说”,而是应该在此基础上来达到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以指导“我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

### 三

冯友兰先生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我认为,这种“反思”并不是“对于实际无所肯定”,而是应该包括“考虑到已获得的认识和对这些认识的批评”,以及“考虑到人类在其一切活动中的各种信念与价值的世界观”。冯先生说,“哲学不能增进人们对于实际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我认为,学哲学的人对于“实际的知识”还应该尽可能地有一个“整全的”认识(因为是“尽可能”,所以哲学的认识永是“未济”),不如此就不足以担当达到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的己任。冯先生的“新理学”要使人立于“物之初”和“理之全”,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整全的”的认识(此处不谈冯先生对“真际”与“实际”的划分)。冯先生说,哲学的“大用”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我认为,这是哲学之“大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哲学除了提高个人(“我的生活”)的精神境界之外,还应该为民族、为人类(“我们的生活”)提供一种协调的价值观。

冯先生多次讲“旧邦新命”是他一生学术著作即“三史六书”的“所以迹”。而中华民族如何实现“旧邦新命”,这在冯先生的《新事论》(副题为“中国到自由之路”)中有集中的表达。这种表达并非只是“对于实际无所肯定”,也并非只是提高

个人的精神境界。<sup>①</sup>

最近读了周国平先生的一篇短文《哲学不只是慰藉》。此文从德波顿的《哲学的慰藉》讲起,这本书“选择西方哲学史上六位哲学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哲学对于人生的慰藉作用”。周国平指出:

人生中有种种不如意处,其中有一些是可改变的,有一些是不可改变的。对于那些不可改变的缺陷,哲学提供了一种视角,帮助我们坦然面对和接受。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一种慰藉。但是,哲学不只是慰藉,更是智慧。二者的区别也许在于,慰藉类似于心理治疗,重在调整我们的心态,智慧调整的却是我们看世界和人生的总体眼光。因此,如果把哲学的作用归结为慰藉,就有可能缩小甚至歪曲哲学的内涵。<sup>②</sup>

我觉得哲学之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慰藉,乃是因为哲学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而哲学之所以能够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则是因为哲学的智慧可以提供一种“我们看世界和人生的总体眼光”,亦即提供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整全的”认识。然而,这种“总体眼光”或“整全的”认识又不只是提高个人的精神境界,不只是慰藉“我的生活”,而是还应该为人类的“我们的生活”提供一种协调的价值观。是重视“我的生活”(个人本位)还是重视“我们的生活”(集体本位),这也是哲学史上争论的价值问题之一,哲学的智慧也应该为“我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提供一种协调的价值观。

就“我的生活”而言,其最大或终极的问题是生死问题,西方有哲学家甚至把人的存在归结为面向死亡的存在。但中国的道家(而非道教)为了精神的“逍遥”乃至齐生死,以达到生活的“悬解”。<sup>③</sup>而中国的儒家更对生死持一种“未知生焉知死”或“乐天知命,故不忧”的态度。儒家之所以轻视生死问题,显然是因为儒家更重视“我们的生活”。当然,儒家也丝毫不轻视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王夫之曾论生死非儒者之“大事”:

浮屠氏以生死为大事。生死者,一屈一伸之数,天之化,人无得而与焉,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而可矣,恶足以当大事哉?君子之大事,在仕与隐。仕隐者,君子之生死也。(《宋论》卷十四)

在宋明理学中,“仕与隐”(又谓“出处进退之道”)确实成为儒者之“大事”。所谓“明体达用”或“内圣外王”,即在宋明的王权之下儒者必须保持“仕与隐”的志向

<sup>①</sup> 参见拙文《旧邦新命——冯友兰先生的文化情怀和文化观》,《传统与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sup>②</sup> 周国平:《哲学不只是慰藉》,《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3日。

<sup>③</sup> 参见拙文《庄子的薪火之喻与“悬解”》,《道家文化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和节操。节操者，即“孔颜乐处”；志向者，即“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此二者缺一，即非宋明的新儒学。范仲淹在《睢阳学舍书怀》中有云：“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周敦颐在《通书·志学》篇亦有云：“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由此可见在宋明新儒家那里，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与其对“我们的生活”的重视是结合在一起的。而“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更明确地表达了要为人类确立价值准则的情怀。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又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为己”即是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而个人又须为“斯人之徒”（人类）担当一种社会的责任。记得梁漱溟先生曾为中国文化书院题词曰：“孔门之学乃为己之学，而已又是仁以为己任的己，此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准此，哲学的作用不仅是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而且还应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一种价值观。质言之，哲学是以达到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为己任。

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的“自序”中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sup>①</sup>在《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的最后，冯先生亦引“横渠四句”，并且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sup>②</sup>当我们今日在探讨“哲学何为”时，亦应以此自勉。

①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463页。

②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0卷，第666页。

# 哲学的批判本性与中国哲学的创新

□张斌峰

“批判”一词在中国本土话语情境里，曾经成了政治革命时代最为流行的话语，这样的“批判”也自然与“批判哲学”或“哲学批判”所追求的“理性批判”或“批判理性主义”格格不入。在西方世界里，古希腊时代的“批判”(kritikos)一词的字根意为洞察、区分、辨别、判断或断定的意思，此外还有敏锐、精明的意思；德文“Kritik”一词的含义主要是研究、考察、区分、辨别和审视的意思。例如，康德的三大“批判”之中的“批判”便是对“理性的自由的和公开的审查”。而“哲学批判”与“批判哲学”之“批判”则意味着，哲学的精神包含着批判理性精神(或“批判理性主义”)，哲学的思维包含着批判性思维，哲学的方法含摄着批判性思维的方法。可以说，批判是哲学的本性，是哲学的基本使命之一；批判更是哲学行使其理性思维能力的必然选择；或者说，任何追求智慧的哲学也理所当然地弘扬与彰显着“理性”的批判精神。而能系统地体现这种批判精神、批判观念与方法的就是“批判哲学”。进一步地说，所谓“批判哲学”乃是对人类精神进行理性的反思与反省，是对人类的主体性、理性能力、认识能力、知识界限进行反省、反思、辨析、否定与重构。因此，哲学的创新，离不开批判，离不开对既往的以及正在生成的哲学批判传统的演变、脉络的考察与清理，离不开对哲学自身的反复考察与思考，离不开对既有哲学理论的限制与边界的辨析、分析、清理、肯定、否定、清除和重构。

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哲学的发展，我们不能只有知识、权力、金钱而没有德性、心性、自由和智慧；不能只有科学、技术和机心而没有人文、哲学与艺术；更不能只有工具理性的泛滥与主宰而没有价值合理性。然而当下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生态已经受到了如此全方位的挑战，怎样因应这样的挑战？但哲学自身当有自知之明：哲学的批判本性决定着它尤当担负起批判的使命，因为“批判哲

学”与哲学的批判传统,可以透过对知识、金钱、权力、目的理性(工具理性或手段理性)、科技理性和逻辑理性对德性、心性、智慧、交往理性或沟通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独霸与宰制的批判,对既定哲学知识系统的批判,使其经受“批判哲学”的洗礼,而探寻到推进中国哲学发展与创新的必由之路。换言之,当下中国哲学的创新,惟有经过批判,经过反省和反思,经过“批判哲学”的洗礼,弘扬中西哲学的批判传统,致力于“批判哲学”的知识化、谱系化、学理化和系统化(既推进分化又促进整合),而使中国哲学获得新的形式与新的生命力。

以下笔者从五个视角,探讨何以通过发挥哲学批判本性,而致力于探寻中国哲学的创新之路。

## 一、以“批判的理性主义”对启蒙理性进行批判性反思 确立面向探索智慧理性的新哲学

持续约 400 年的西方启蒙运动是一个思想解放、社会解放运动的理性化过程。只是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完全取得胜利时,理性权威才真正确定,西方的启蒙运动才完成其历史使命。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也就是说,启蒙就是消除神话,就是“用知识来代替想象”。而近代启蒙也便是驱除世界的魔力(即“祛魅”),以便让“战胜迷信的理性”去“指挥失去魔力的自然界”。“祛魅”便指驱除魔力,破除神秘性。经由“祛魅”而确立的启蒙精神是一种推崇实证、推理与分析的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精神。这种理性有下面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是怀疑;第二就是分析批判,即对经验材料和事实进行分析,寻找根据和理由,不轻信,而分析就是划清界限,批判就是辩证的否定、辩证的扬弃;第三是证明或证伪的推理思维。这便是启蒙理性(主义)的基本内容。

20 世纪的批判理性主义思想家卡尔·波普对人类理性能力的反省,为我们批判启蒙理性主义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资源。他认为,启蒙理性主义深受笛卡儿的唯理论和培根的经验论的影响,但无论是笛卡儿的唯理论还是培根的经验论,都带有强烈的独断色彩。笛卡儿认为从绝对无可怀疑的“第一原理”出发,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可以建立起绝对无错的真理大厦。培根则认为,从确定无疑的经验事实出发,运用排除的归纳法,可以建立起万无一失的知识大厦。但是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以其清晰的论证向我们表明,人类知识是可错的,没有什么纯粹的真理体系,连知识的典范——自然科学——也是包含着错误的。人类诚然只能用理性去认识世界中的具体事物,但理性的方法只是尝试地提出猜想再批判地排除错误的方法。<sup>①</sup>

---

<sup>①</sup> 卡尔·波普著、傅季重译:《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卢风教授在《启蒙之后》一书中认为,对启蒙理性主义作批判性的考量,并不意味着反对理性主义,只能说明启蒙主义者及其20世纪的继承者对理性的理解有严重失当之处:过分夸大了理性认知世界的作用,认为人类理性可穷尽自然界的一切奥秘,是其严重失当之一端;而把人类理性完全等同于科学理性则是其严重失当之又一端。究其弊端之处在于,本来人类理性可表现为科学理性(即科学家们探究自然奥秘的理性),也可表现为智慧理性(即在道德、宗教、哲学人文学科中所得以体现的理性),而启蒙理想主义者则无视智慧理性的存在,或者将科学理性凌驾于智慧理性之上或者取而代之。那么,当代哲学该怎样分别科学理性与智慧理性(或知识与智慧),超越科学理性至上,专注于智慧(理性)的营造?答案是,惟有透过批判,也就是经过批判反思,我们才能在知识与智慧这两种信念体系之间作出真正有智慧的选择。<sup>①</sup>

卢风教授的批判性智慧在于,他指出了知识与智慧之间的两种基本区别:第一种区别在于,知识关乎工具合理性,而智慧关乎价值合理性。所谓工具合理性是指为实现一个明确的目的而对方法、手段的设计和选择,有了一个明确的目的(或目标),对实现该目的(或目标)的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或手段的设计、算计和选择便是工具合理性的典型表现。而所谓价值合理性当指精神求索之中的主体对信仰和终极价值(即一个人之“价值谱”中的首位价值)的反思和选择。基于这样的“分别智”,不难发现,掌握“哲学”的“批判”智慧,正可帮助我们追寻“价值合理性”的智慧。因为,有了这样的“价值合理性”要领之后,我们便会自然而然地有了发自于信仰和终极价值的不计功利、不计后果的行动。显而易见,光有知识不足以保证“价值合理性”;有了智慧,有了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博大圆融的理解,才会有价值合理性。西方学者尼古拉斯·麦克斯韦伯特别强调智慧涵盖着对价值的理解,他认为,智慧就是发现和实现生命价值的欲念、实际努力和能力;智慧包括知识和知性,但又超越了知识和知性,因为智慧包括了追求价值的欲念和实际努力、帮助自我和他人实现价值的能力、解决与价值实现相关的问题的能力,以及使用和发展知识、技术和知性(为实现价值)的能力。

而知识与智慧的另一个区别是:知识是人类认知的结果,即是对外部对象认知的结果,而智慧是理解性的,是人类对世界、社会以及人本身(包括他人)理解的结果。然而在启蒙理性主义的影响之下,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中已只有知识,没有智慧。其实,科技理性(或科学理性)只是人类理性的一个侧面,人类理性还有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侧面,这便是智慧理性。但启蒙学者们认为,只要开启了人们的理智,使人们有了知识,便会有全面的社会进步,包括道德进步,实际上也就是认为科技理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科技理性不仅可以揭示自然奥秘,从而能使人类控制自然

<sup>①</sup> 参阅卢风的《启蒙之后》,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